

■ 陈 榴\著

东去的语脉

—— 韩国汉字词语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去的语脉

—— 韩国汉字词语研究

陈 榴\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连 ·

©陈 榴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陈榴著. 一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1103-236-9

I. 东... II. 陈... III. 教育学-中学教师-资格考核-自学参
考资料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426 号

出 版 人:程培杰
责任编辑:张晓芳
责任校对:王 钢
封面设计:方力颖
版式设计:孟 冀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邮 编:116029
营销电话:(0411)84206854 84215261 84259913(教材)
印 刷 者: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发 行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8
字 数:240 千字

出版时间: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序 言

林从纲

(大连外国语学院韩国语系教授)

我和陈榴教授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却分居东西两端;而且由于我们分别供职于两所不同的高校,且从事两个不同的专业,故原先并不相熟。陈榴教授的专业是汉语史,而我的专业则是韩国语。让我们结缘的是近年来我们都致力于韩国语词汇的研究,这使我们有机会经常相互切磋、相互交流,于是在交流中加深了理解,在切磋中形成了共识。在交往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在研究过程中所倾注的心血,现在他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即将出版的大作——《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为了本书的写作,陈榴教授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准备。他曾在韩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了五年,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好学深思,远搜旁绍,拾遗补缺,孜孜以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结识了许多知名的韩国语学者,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回国以后,陈榴教授又于2003年承担了辽宁省社科研究基金项目(L03BY009)——中、日、韩三国汉字词语比较研究,并于2005年顺利结项。至此,本书的撰写已初具规模。嗣后,他又在项目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反复的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凝结着多年心血的书稿。对于他的这部大作,我有幸先睹为快,快读之余,书稿的饱满与生动不禁让我眼前一亮。这部书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其一,广泛地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韩国汉字词语的研究成果。陈榴教授在撰写本书时充分占有资料,凡涉及韩国汉字词语的本体研究及相关研究的资料几无遗漏。这些资料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有关汉字词语本体研究的论著,如金亨奎的《国语史概要》、徐炳国的《大学国语学史》、李基文的《国语史概说》、沈在箕的《国语语汇论》、朴英燮的《国语汉字语汇论》、李得春的《韩文与中国音韵》、小仓近平的《朝鲜语学史》、拙作《韩国语词汇学》等等;二是有关韩国汉字词语生存背景的论著,如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一然的《三国遗事》等等;三是有关韩国汉字词语的语料,如汪维辉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与犹堂全书》《俞吉浚全书》《退溪日记》等等,以及《韩国汉字语辞典》等大型工具书。陈榴教授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纠偏正误,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因此,可以说本书集中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关于汉字词语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本

题研究的一个新水平。

其二，本书对韩国汉字词语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继承的基础上续有创新。陈榴教授踵事增华，厚积薄发，对韩国汉字词语考核精审，常有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例如第三章对汉字词语的语义辨析，通过比较探讨汉字词语的语义变迁，分析鞭辟入里、极见功力；又如第四章认为《训民正音》对朝鲜时代的汉字音“规而未范”，其所属音系实际上是一个杂糅的音系，包含了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读书音和口语音）等元素，而这个杂糅的音系对于韩国语的语音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所论凿凿有据，令人信服；尤其是陈榴教授在本书中首先提出，韩国语中汉字词语的大量吸收和长期应用，可能对韩国语黏着语类型特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观点虽未完全展开，但有可能为韩国语类型学研究及谱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视角。从这一意义上讲，本书已经不限于对汉字词语本身的研究，对于完善词汇学中的借词理论并进一步推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本书思路缜密、结构严整、脉络清晰、要言不烦，在同类著述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点。本书首先描述了汉字词语的输入过程，探讨了汉字词语的不同来源；然后分析了汉字词语在异语言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考察了汉字词语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最后阐述了韩国语吸收汉字词语的文化背景，并对汉字词语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这样的结构和论述方式，不仅使作者的写作动机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而且使本书具有了教科书的性质。本书对语料的处理全部经过认真的遴选与核对，汉字词一般均附有韩文表记和国际音标标记，书后附有韩国常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词语表，方便读者，用心良苦，同时也充分反映了陈榴教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拜读一过，深感获益匪浅，稍觉美中不足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未能完全展开，只是点到为止，虽亦发人深省，终觉尚未止渴。不过，陈榴教授认为，韩国汉字词语的研究是一项综合工程，其成果不仅对韩国语的词汇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高校韩国语的教学及韩国人学习汉语也具有实用的价值，因此，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尚未思考成熟或材料不足以征的问题，不能轻下结论。陈榴教授的这种审慎态度，我深以为然。目前，他正擘画下一步对日本和韩国的汉字词语进行类型学研究，拟从文化、心理、认知、比较等多种角度切入，以期有进一步的发现，我们对陈榴教授的后续研究充满了期待。

总之，陈榴教授的这部大作是研究韩国汉字词语的最新成果之一。学术乃天下公器，我虽先睹为快，但不敢秘而不宣，又恰逢陈榴教授嘱我作序，故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希望诸位在阅读之后能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2007年 元旦

目 录

文化移民：韩国汉字词语概说	1
一、朝鲜半岛与汉字文化圈	4
二、汉字的应用与汉字文体的嬗变	12
三、汉字词语的吸收与融合	24
客从何来：汉字词语的来源	37
一、来自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字词语	42
二、来自中国汉译佛经的汉字词语	64
三、来自中国古代白话的汉字词语	75
四、来自近代日本的汉字词语	87
五、韩国自创的汉字词语	94
身在异乡：汉字词语的内部形式	101
一、汉字词语的演变	103
二、汉字词语的结构	109
三、汉字词语的语义	122
四、汉字词语的词性	136
乡音未改：汉字词语的外部形式	139
一、《训民正音》的创制与汉字音	141
二、韩国语汉字音的性质	150

三、现代韩国语中的汉字音	161
帆影展痕：汉字词语的学习与研究	168
一、汉籍的流入与汉语的学习	169
二、专门机构的建立与汉语教学	172
三、汉语研究与汉字词语的规范	177
身土不二：汉字词语的回顾与前瞻	185
附录一 现代韩国语常用汉字词语	201
附录二 汉字及汉字词语东传朝鲜半鸟大事年表	242
附录三 英文内容简介	244
附录四 韩文内容简介	245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0

■文化移民：韩国汉字词语概说■

山脉、水脉、血脉、文脉，链接着中华文化的流脉。

在中华文化的流脉中，流淌着一条汉字词语的语脉。

在浩瀚的太平洋西岸，从东北到西南，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环绕着中国大陆，构筑了一个古老的汉字文化圈。E.萨丕尔指出：“只有五种语言在传布文化上有过压倒优势，它们是古典汉语、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① 这些语言都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圈，但无论是形成的历史与范围，还是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这几种语言文化圈都不能与汉字文化圈同日而语。一般来说，一个文化圈的形成，必然有一种处于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而这一强势文化必然要有完备的语言文字系统为依托。在很长的一个历史进程中，汉字文化具有无可争辩的强势地位。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不仅使它具备了记录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而且使它产生了向外辐射的能量。公元前后，时逢西汉盛世，汉字势力开始向四周扩张。当时的日本、朝鲜、越南等远未出现大一统的国家，文化落后，方言歧出，文字更属空白。汉字的输入，无疑为其提供了文化利器，为其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过两千年对汉文化的萃取，历史上的日本、韩国和越南已经将汉字使用得纯熟而自如，大量的汉字词语已经融入它们的民族语言，成为各自母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中，都没有把汉字词语视为“外来语”。在汉字输入和使用的全盛时期，日语、韩国语和越南语中的汉字词语均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在现代，汉字词语虽然有所萎缩，但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

^① 萨丕尔《语言论》p174，商务印书馆，2003年。

现代日语中的汉字词语约占全部词汇的 53.6%^①；现代韩语中的汉字词语约占 60%，政经类文章中可占 63%^②；现代越语中的汉字词语也有 60%，政经类文章中可占 80%^③。可见，汉字词语既是亚洲邻国吸收汉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充实和完善本民族语言词汇系统的重要手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汉字词语”，顾名思义，是指可以使用汉字标记的词语，具体而言，就是从汉语词汇中引入或运用汉字自造，并且已经融入本民族词汇系统中的汉字标记词语。这些词语大都源自汉语。尽管越南已经不再使用汉字，韩国和日本也已经限制使用汉字，但汉字词语仍保留在其语言中，只是更换了记录符号而已。还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汉字词语”并非都是源自汉语的，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自己使用汉字，按照汉语造词法规则创造的词语。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得开放风气之先的日本曾创造和使用大量汉字词语表述西学概念，这些汉字词语遂又回流中国，对汉语的词库又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这种“词侨归国”现象的发生，反映了传统文明的衰落和近代文明的崛起。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字词语在历史上曾为汉文化的输出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近代则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文化又一次吸引了各国关注的目光。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全面考察汉字词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地位，显然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潮来潮去几今古，大海西连数峰隔。”（李退溪）由于地利之便，韩国是最早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是汉文化传统保留最为完整的国家。汉字在历史上曾经是韩国的通用文字，这一过程延续了有一千多年。韩国语和汉语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但在词汇上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大量的汉字词语不仅负载着古

① 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p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② 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p37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③ 于维雅《东方语言文字语文化》p24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代的文化信息，而且保留着系统性很强的古代读音，这使得韩国语中的汉字词语成为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在这一点上，韩国语中汉字词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来说，不同民族语言之间词语的相互借用，大都发生在同一语言类型的语言之间，而且借用的词语在词汇中只占较小的比重。韩国语则不然，它从分属不同语言类型的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汉字词语，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均令人叹为观止。就语言类型而言，汉语是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韩国语是黏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就词语结构而言，汉语以复合结构为主，韩国语的固有词以派生结构为主。在这样迥然不同的语境中，韩国语的词汇系统容纳了数量可观的汉字词语，并与本民族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一现象本身即具有典型意义。众所周知，借词的发生必然要受到本民族语言规律的制约，但汉字词语在形式上未加改造便进入韩国语，并深深地扎下根来，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语言对外来成分的容纳能力，这也是我们选择韩国语的汉字词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课题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以深入探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与语言渗透的关系。韩国语中的汉字词语既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又是语言渗透的结果。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与研究，可以揭示出汉字词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从而描写出韩国语中汉字词语的基本模式，以及汉字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异。

其二，可以进一步检验和丰富词汇学的基本理论，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在比较语言学中，词汇的比较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本课题的研究将在借词理论，如借词的移植与变异、借词的衍生过程、借词与语境的关系等方面，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从而从一个侧面丰富词汇学理论。其三，可以全面观照和了解韩国人的语言文化心理，为更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开辟通路。由于中、韩两国长期的文化交往，以及汉字词语全面的浸润，韩国人逐渐形成了与中国人类似的语言文化心理，正是在这种语言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两国形

成了类似的汉字文化模式和语言审美情趣。语言，尤其是表述概念的词语，在文化上具有自我陈述的力量，这是它在产生时即已获得的。当它被另一种语言主体借用时，尽管可能会发生语义上的变化，但附着其上的文化因子仍会发挥巨大的感染作用，从而影响借用者的思维与心理。从这一意义上讲，当韩民族在使用大量的汉字词语时，已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

其四，可以进一步考察韩国语的类型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为确定韩国语的语言谱系提供思路。韩国语的语言系属一直未形成定论，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类型语言学的完善。学界认为，黏着语是处于屈折语和孤立语之间的语言类型，但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凡是大量吸收汉字词语的国家，或为孤立语（如越南语），或为黏着语（如日语和韩国语），均未演变为屈折语。这说明汉字词语对黏着语类型的形成应当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黏着语的重要特征主要是通过附着在词根上的词缀来表示语法意义，没有词根，词缀则无从附丽，而汉字词语一直充当着词根的角色。就韩国语而言，由于汉文化的长期熏陶及汉语的深刻影响，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诸多要素，无不留有汉语的痕迹，这必然对其类型特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韩国汉字词语的研究，我们将梳理出韩国语所表现出来的类型特征，并为最终确定韩国语的谱系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朝鲜半岛与汉字文化圈

朝鲜半岛（韩国与朝鲜）是汉字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地区，它在汉字文化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力先生指出：“汉语自秦汉以后，由于汉族文化的先进，逐渐传入了外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都接受了汉语的巨大影响，向汉语吸收了大量的词语，成为它们自己的词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①《汉语史稿》p597，中华书局，1980年。

汉字是汉字文化圈的纽带，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汉字都曾长期充当通用文字的角色。后来，各国虽然先后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仍谦称为“谚文”“假名”和“字喃”（意为俗字），表明了汉字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近代以后，越南、朝鲜废止汉字，日本、韩国亦限用汉字，但其语言中这些使用汉字记录的词语仍然保留着，正是这些汉字词语仍在维系着汉字文化圈的存在。那么，汉字文化圈是怎样形成的？朝鲜半岛在汉字文化圈中又占有怎样的地位？这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新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中日关系史上，曾有徐福东渡抵达日本的传说，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籍虽有徐福东渡的记载，但并未明确指出其“止王”之地就是日本列岛。有据可查的是，中日之间的人员交通应不晚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据《后汉书·东夷传》载，这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颗镌有小篆“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佐贺发现。据此推定，日本人接触汉字也应该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日本文化的后进使其对文字的需求更加迫切，而文字的创制需要文化的支撑。对一个草莱初辟的国度而言，创制一套文字系统绝非一日之功，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直接采用汉字。一般来说，要掌握一套陌生的文字体系，并进一步使其普及成为书面的交际工具，仅靠人员交往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规模地输入和学习以汉字为媒介的中国汉籍。日本呼唤着能承担此任的文化使者，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位百济人应邀而出。据成书于712年的日本《古事记》载：“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贤上人，名和迹（一说即王仁）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又据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之始祖也。”二典的记载虽有文字上的不同，但汉籍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则是一致的。成书于751年的《怀风藻》序言中也提到了王仁，云：“王仁

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辅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汉籍的传入使日本人有了学习汉语、汉字的读本，自然加快了全面吸收汉文化的步伐。公元6世纪，汉传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并迅速在日本流传开来。如果说汉籍的传入使日本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汉字，那么，佛经的广泛传布则进一步普及了汉字，扩大了识字阶层。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汉文乘势跟进，成为日本正式的官方文体，例如公元478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上表文，以及公元596年予道后温汤碑的铭文，都是将日语内容转换为纯粹的汉文形式。随着汉字文化的广泛普及，汉字的表记功能逐渐被发展到极致，直接用来表记词汇中的核心层——专名。从公元7世纪起，日本全面引入中国的典章制度，陆续将天皇的年号、谥号、人名、地名等最具民族性的词语汉化。日本最早的年号是“大化”（645—650），出典于《吕氏春秋·大乐》。其后出现的年号有“大宝”“庆云”“宽和”“永祚”“天安”“长德”“明治”等，至今日本仍是东亚唯一使用汉字年号的国家。天皇谥号的出现始于公元8世纪，淡海三船（722—785）奉命仿照中国为日本天皇拟定谥号，第一代天皇号为“神武”，其后为“绥靖”“安宁”“懿德”“孝谦”“纯仁”“称德”，直到淡海所处时代的“光仁”。日本的年号、谥号用字皆取自中国古典典籍，表明了对儒家文化的尊奉。自奈良时代起，日本的人名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早期的人名大都使用动物名称，或再配以他字；平安时代的人名“始尚文焉”，开始注重汉字的含义要美好；镰仓时代延续了这一命名传统，并确立了二字双名的体式。地名的表记最初采用汉字注音的方式，如“意柴沙加”“斯归四麻”等，后来在汉字文化的熏陶之下，日本人开始重视汉字的含义，有意识地筛选地名用字了。《续日本记》载：“凡诸国郡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其方法是不再使用与意义无关的音读假名，而改用含义美好的汉字表记，但读音仍采用训读。汉字文化向日本文化核心的渗透，表明汉字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已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即“文字的威望”（索绪尔）。

汉字的普及使日本人认识到了文字的表记功能，他们开始尝试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的语言了，实际上，这是汉字表记功能的放大与延展。日本学者本宫泰彦认为，汉语、汉字“加深了日本语言的

内容，丰富了日本国民的思想”，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以深厚的文化为其底蕴的。全面地输入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也就是全面地接受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而当日本人掌握了汉文、汉字的功用，并进一步使用汉字记录和表达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时，我们认为它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但是，汉字毕竟是外来的文化资源，汉字字数众多，而日语只有 47 个音；同时，汉字在记录属于孤立语的汉语时得心应手，但在记录属于黏着语的日语时难免胶柱鼓瑟，于是，创制一套自己的文字常常令日本人神往。8 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初期，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利用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意思是平易通俗的字）。12 世纪的院政时期，又产生了源于汉字“省字”的“片假名”（意思是不完整的字）。至此，日本人将表意性质的汉字转变为表音性质，借助汉字的读音，将汉字的功能进行了巧妙的挪移，并将汉字的读音悄然无迹地融入了日语的语音系统。从此，“假名”进入了日本文字系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汉字、假名混用的书写文体。

假名的发明和使用并未使日本人忘情于汉字，他们不仅在近代引进西学时又创造了大量的汉字词语，而且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只有日本现在仍采用有大量汉字的书面文体。也正是因为汉字词语的存在，日语文本是不需要语词间隔的。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日本的知识阶层，还是日本的普通国民，都无法想象取消汉字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越南是与我国山水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至少有两千年以上。《史记·南越尉陀传》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末，南海郡尉赵佗乘乱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南越国，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其地为交趾，下设九郡，开始对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汉语、汉字开始向越南渗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可见，时至东汉，由于汉族政权的直接管辖，以及大量中土移民的迁入，汉

语和汉字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越南语大量吸收汉字词语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东汉后期的交趾太守士燮在当地办学，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授越人，汉语、汉字遂成为传播汉文化、沟通汉越两族的重要工具。东汉末年，三国鏖战，中原板荡，许多文人名士避难交趾，如刘熙、薛综等人。他们踵事增华，一面收徒办学，一面著书立说。当汉语、汉字走入课堂的时候，汉文化已经渗入越南民族文化的血脉。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在交趾推行科举，广泛网罗人才。据《新唐书·姜公辅传》载，日南（今越南中部）人姜公辅精通汉学，“有高材”，中进士举后曾任翰林学士、右拾遗。在这一时期，交趾地区通行双语，即汉语和越语；而只通行一种文字，即汉字。有学者统计，越南语中的汉字语词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传入的，其发音则为唐音（长安音），与《切韵》有着整齐的对应关系。王力先生称这些汉字语词为“汉越语”。

13 世纪初叶的李朝时期，越南出现了一种以汉字为造字材料，以汉越音为读音，用来记录越南语的方块文字——字喃，又称“喃字”。“字喃”的意思是“俗字”，这是相对于“儒字”（汉字）而言。这与日本称自己造的文字为“假名”，而称汉字为“真名”一样，并非要取代汉字，而只是作为弥补汉字在记录本民族语言时力不能及的一种辅助工具。所以，字喃始终未能取代汉字而成为国家的正式文字。汉字的衰落是从 19 世纪开始的，当时由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越南的封建体制和以汉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这一时期，越南通用三种语言，即越语、汉语和法语；汉字仍在流通，但已呈衰势，17 世纪上半叶由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国语字”开始大行其道。1945 年 8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宣布国语字为国家通用文字，汉字最终退出了越南的书面语交际。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水相连，因此，两地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韩国学界虽然尚不完全认同“箕子朝鲜”的传说，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已是不争的史实。由于汉文化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向朝鲜半岛辐射，故朝鲜半岛更接近华夏文化

精神。《汉书·地理志》云：“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这里所说的“东夷”通常即指中国东部的黄渤海地区和朝鲜半岛。

汉字正式输入的时间很难作出精确的考证，但公认一般在公元前 2、3 世纪时的战国时期。因为在朝鲜北部曾出土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钱币，共铸有 3000 多个不同形体的汉字。公元 1 世纪，朝鲜半岛已经出现了记录地名和国名的汉字“取音语”，例如盖马山中的“盖马”二字就是朝鲜语的记音字；三韩时期的“马韩”“辰韩”“弁韩”也是汉字取音语，其中“马”是“南边”的意思，“辰”是“东方”的意思，“弁”是“光明”的意思，而“韩”则有“大”意。新罗在建国初期没有文字，《梁书·诸夷传》载，新罗“无文字，刻木为信”。但很快便引进了汉字，并借用汉字更改了国号和官职名称。可见，公元 6 世纪前，朝鲜半岛不仅输入了汉字，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标记朝鲜语音了。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汉字、汉文的正式传入时期应为卫满朝鲜建立的公元前 195 年前后，随着汉四郡的设立，以及汉民族向半岛的规模性移民，汉字、汉文逐渐在半岛普及开来。汉武帝设立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开始对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要保证政令的通畅，必须确立汉文、汉字的权威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汉字才有可能成为通用文字，亦即官方文字。

由于地利之便，加上韩国在引进汉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大量汉籍陆续进入半岛，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资源。从高句丽时代起，《玉篇》《字统》《字林》等已经是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统治阶层的汉字、汉文水平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位于吉林集安的好太王碑（又名广开土大王碑）即为明证。嗣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奉行“事大慕华”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奠定了汉字、汉文在半岛的权威地位。真正使汉字在民间普及开来的原因是汉传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早在东晋时期，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唐朝时期的佛教，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传入新罗的汉传佛教也已经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成为统一新罗的

主流意识形态。自高丽王朝开国之君王建起，历代诸王皆笃信佛教，从而促使汉传佛经广泛传布，佛教信徒遍及半岛，现藏韩国海印寺的《八万大藏经》就是为了满足当时读经、诵经的渴求而刻造的。汉字随着佛经的传播走进了半岛的千家万户。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汉字不仅成为朝鲜半岛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文化利器，而且逐渐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于是，大量的汉字词语从书面进入口头，逐渐融合到韩国语中，其中一些汉字词语甚至取代了韩国语的固有词语，从而形成了汉字词语在韩国语词汇中的强势地位。同时，由于本民族的文字尚未产生，汉字遂又成为记录语音的符号。但是，汉语与韩国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记录汉语方面得心应手的汉字，在记录韩国语时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韩国语中的语尾变化，以及各种助词标记，不是单音节的表意汉字所能胜任的。为了解决语言和文字不相统一的矛盾，朝鲜半岛的一些学者，如薛聪等人曾发明了“吏读”“口诀”等表记方式，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由于汉字忽而表音，忽而表意，纠缠纷扰，治丝益棼。于是，朝鲜朝世宗大王（1419—1450 在位）痛下决心，组织了集贤殿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恒等人，编写了《训民正音》（1444），创制了韩民族自己的文字——谚文。谚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它有 11 个母音，17 个子音，一共 28 个字母。尽管谚文与表意的汉字性质不同，但在语音的表现及字型的构造上仍然受到汉字的影响。

谚文的创制虽然受到底层百姓的欢迎，一些民间创作也开始采用谚文，但上层社会与那些士大夫们却并不买账，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使用汉字、汉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官府의 正式文书、文人的各种创作，仍旧采用汉字、汉文。于是，在朝鲜半岛出现了两种文字和两种文体，一是代表雅文化的汉字、汉文，一是代表俗文化的谚字、谚文。直到 19 世纪末期，才由著名的开化学者俞吉浚首创，出现了国汉混用文体。

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韩国的汉字文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